

中共國家觀念的建構： 從建黨到延安整風時期

專
題
研
究

The CCP's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State Concept:
from 1921 to Yan'an

李英明 (Lee, In-Ming) 賴皆興 (Lia, Chieh-Hsin)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班

摘 要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國家觀念的建構、形塑與轉變，歷經了一整個時代的變革，可以說，幾乎就是通過整個二十世紀的具體實踐，中國才摸索出屬於自己的國家觀。換言之，「中國」從文化或地理概念到發展成一個正式的國家認同，並不是自然發展、形成的，而是經歷過一段長時間的革命實踐與認同建構的過程。而在這一段革命實踐與認同建構過程中，「中國」的國家概念與西方啟蒙以來的民族國家發展概念是大不相同，這種國家觀念不是單純的以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作為訴求的內容，而是通過民族主義和階級革命在中國的辯證發展下所產生，並且通過一套集體認同的形塑和建構過程來完成的。本文便是探討從中共建黨到毛澤東延安整風時期，中共如何通過中國具體國情與革命實踐經驗而建構、形塑這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觀念。

關鍵字：中國、建構、階級、延安整風、毛澤東

壹、前 言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國家觀念的建構、形塑與轉變，歷經了一整個時代的變革，可以說，幾乎就是通過整個二十世紀的具體實踐，中共才摸索出屬於自己的國家觀。值得注意的是，這裡的「國家」指的並不是西方意義上的國家，而是在通過中國革命經驗和中國具體國情辯證相結合下，所發展出來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觀念，簡言之，這種國家觀念不是單純的以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作為訴求的內容，而是通過民族主義和階級革命在中國的辯證發展下所產生的。

中共的國家建構不是通過單純的對政府、主權、領土的訴求來建立，而是在通過對階級、對革命過程中的身體和精神、意識方面的全面改造而建立起來的。這樣的國家建構在中國建黨革命初期尚未被落實，但是在毛澤東掌權以後便十分明顯，從延安整風到文化大革命幾乎都在做相同的事：通過階級革命來鼓舞、造成群眾動員或群眾運動來重新賦予中國人的身體和精神、意識歸屬，並且通過對個人身體、精神和意識的政治性意涵建構進而形成一個集體而且完整的國家概念。換言之，毛澤東通過話語論述的建構，將階級概念與群眾的身體、精神相結合，創造出一個融合民族與階級取向的國家觀念，將人們原來附屬的政治思想、社會、宗族所建構出來的權力關係打破，讓中國人民的身體從傳統的朝廷、宗族社會或說是「舊的中國」解放出來，成為階級的一環；同時也通過階級讓人民的身體附屬於社會主義革命、附屬於一個新中國。這個新中國的內涵，不僅是與舊中國截然不同，並且也是有別於西方的資產階級國家意涵。說得明白一點，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走的是一條沒有「國家」或「去西方國家」的「國家建構」。

本文主要探討中共國家觀念的建構與轉變，我們將從中國在殖民心態下所產生的國家觀念做為論述起點，梳理中共的國家觀如何在抗拒西方資產主義國家觀與接受西方馬克思主義國家觀的革命實踐中，結合中國具體國情走出一條既不附屬於西方傳統，但又截然不同於中國傳統的國家建構道路。並且進一步探討這種國家觀念建構的背後，存在何種不同於以往的新思維與操作模式。

貳、民國初年的國家觀建構

在中國歷史上，中國這個概念在不同時代代表不同的地理指涉，同時也依據這些地理指涉涵攝了不同的文化意涵。也因此難怪白魯洵（Lucian W. pye）會有：「中國是一個文化，卻假裝是一個國家。」這類話語出現¹。近代中國概念的真正確立與形成，是在與西方民族國家接觸的過程中，通過西方人的視野才被逐步確立下來的。換言之，「中國」之所以成為一個完整的國家概念，其實並不是通過如西方民族國家般的建構過程，而是來自於西方的東方主義思考與建構，勾勒出一個完整卻未必是真實的中國圖像，而這種充滿西方視野的中國圖像再通過中西接觸的種種經驗，反射回到當時清末的知識分子眼中。儘管在今天我們已經很習慣將中國視為一個整體／主體，但其實中國歷史上的「國家」概念始終不是指涉一個完整的地理實

¹ 引自張登及，*建構中國—不確定世界中的大國定位與大國外交*（臺北：揚智，2003年），頁308。

體，充其量只是一個執政的朝廷、一個統治威權而已，種種的國家觀念或理論其實也都是立基於以朝廷統治為中心而發展出來的²。

也因此，如果不是西方外族的入侵終於使得中國人民意識到「中國」（作為相對於他者的我群）／西方（作為相對於我群的他者）的不同，使得中國的民族主義在這一段時間與空間的作用下，由地緣和歷史淵源的角度跨越了傳統對中原的文化、血緣、歷史的認知而凝聚出一股更大的「中國認同」的話。中國今天是否能成為一個全球體系中完整的「個體」，或許尚待考驗。當西方的船堅砲利為中國帶來千年未有之變局時，中國人不分滿漢才開始興起了一股同仇敵愾之心，而中國的整體國家認同也才在這種情形下被形塑完成³，由一個大一統的國家認同取代了傳統的族群認同。可以說，整個中國意象的建構在此時才通過一個確實的「他者」形象反射而明顯的呈現出來，中國自身也從一個不確定、模糊的文化指涉向清晰的、明確的地理實體意義過渡。

當中國的民族認同在這種藉由強烈的「西方他者」建構／形塑完成後，很遺憾的，首先必須面對便是一種民族或國家自信心的喪失與自我認同的迷失，用一個更強烈的字眼來說，中國的民族／國家建構是來自於對整體的民族／國家尊嚴喪失後所產生的反思與覺醒，而產生對民族／國家自我認同的重新建構，這雖然是來自於對他者的抗拒所產生的一種追尋與振作，但卻讓中國人首次願意真正面對「國家」這個議題，這裡的國家所指涉的不再是傳統以天朝自居下的國家朝廷觀念，而是相對於西方／外國勢力下的包含地理和文化意義上的「中國」所產生的國家概念。

中國百年前知識分子的困境是，大多數國民都只有天朝意識，沒有國家概念⁴。但是經歷了這一番千古未有之變局後，許多有志之士開始思考「國家」究竟為何物，這種思考的緣起一方面是受到西方思潮傳入的影響，但更重要的卻是對自身家國民族之不振而受外侮所辱而產生的不得不然的反思。他們開始思考國家與朝廷／統治者之間的分界，思考國家與統治者、人民之間的關係、開始思考國家的形成要素。例如康有為、梁啟超、陳獨秀等受到西方國家理論較多啟發的人紛紛從國家的三要素來詮釋國家的構成，強調領土、人民、主權的完整與不受侵犯性，而嚴復甚

² 參見張緒剛，「中國傳統的國家觀」，*通化師範學報*（1994年第三期），頁62-66。

³ 史景遷認為，1889到99年間，列強對中國的施壓與蹂躪，使得中國在擔心被「瓜分」而產生對列強的敵視與驚懼的氛圍中，中國悄然萌生一股蓬勃力量，這種力量表現的方式各不相同，但可以用「民族主義」一詞加以概括，對中國人而言，民族主義包括他們與外國列強、滿清關係的一種新而迫切的認識。民族主義同時也彰顯中國人為了民族的生存，必須團結一致的相應認知。中國民族主義的增長與複雜，是晚清社會重新追索自我定位的一個面向。見史景遷著，溫洽溢譯，*追尋現代中國：最後的王朝*（臺北，時報文化，2002年），頁286。

⁴ 石之瑜，*中國的文化與中國的民*（臺北：風雲時代，1992年），頁59。

至出現「國者，斯民之公產；王侯將相，國之公僕隸也」這樣與以往觀念大相逕庭的話⁵。從康、梁、嚴復等傳統知識分子到陳獨秀這般的激進青年俊彥都在西方的國家理論影響下，重新反省、審視中國傳統國家的構成、存在與組織問題，除了反應出西方思潮的深刻影響和上述諸人救亡圖存的拳拳之心外，更重要的是，以一個完整中國的國家認知來思考中國的國家圖像與發展的基礎已經被確立，也因此，梁啟超在這種體認下，把民族主義區分成大民族主義和小民族主義：前者強調的是救整個中國，後者則是從漢族的觀點強調要推翻清廷建立一個與列強比肩的國家⁶。梁啟超的「大民族主義」雖然是以其保皇立憲思想作為出發點，但卻不可否認的是立基於「大中國」的思想上，而他批判革命黨人「小民族主義」，雖然不可免的具有政治本位，但撇開政治立場，梁啟超這兩種分法卻也如份的表達出「舊中國」和「新中國」的思維意涵。

雖然這時候知識分子的國家觀念思考幾乎是追隨西方的國家理論而來的，但是這種思考的背後除了希望為新中國建構全新的國家觀念，更重要的是通過全新國家觀念的建構來達到富強的地步以抵禦西方的侵略。換言之，這種國家建構是具有相當強烈的「他者抗拒」目的意涵，西方的存在勢不可免的成為中國認同強化的對比目標，特別是西方國家對中國的事務的干預和對中國主權的干涉，更被中國人民視之為是一種莫大的侵略與侮辱。也因此，雖然西方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從未真正的在中國的領土上開花結果乃至殖民中國，但它這一套操作模式卻深深的影響了中國，中國雖然沒有真正被殖民過，卻產生了一種被殖民或是被占領的恐懼感與厭惡感，這種恐懼感與厭惡感讓中國人不只讓中國人對自己的國家民族感到失望與悲哀，更因此對西方升起了一股反抗之意，這便讓中國人希冀找到一套既可以讓中國重新站起來，又可以與之抗衡匹敵、不與其相同的思想依據或行為模式來。這種當中國人對自身的傳統思想文化感到迷惘、失望與不足之時，而希望能由外面找到一股讓中國得以「新生」的力量。促使西方的思想絡繹不絕的進入中國，開啟了中西方思想第一次真正以現實／實用的觀點來產生「對話」。

⁵ 參見李華興，張元隆，「中國近代國家觀念轉型的思考」，*安徽大學學報*（第29卷第1期），2005年1月，頁1-11。

⁶ 參見張玉法，*中國近代現代史*（臺北：東華書局，1992年），頁183。

參、中共建黨初期的國家觀與操作

西方文化思想被廣泛熱烈的討論，大抵是在民國初年的「啟蒙運動」和「新文化運動」時期，充滿熱情的知識分子處在一個動盪的時代下，念茲在茲的是如何將中國由羸弱不振的局面中解救出來。啟蒙運動輸入了許多外來思想，包含各家各派的學說、理論與主義，這些都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和知識造成衝擊，也造成所謂傳統派和改革派的論戰爭辯。在1910-20年代，知識分子成為變革的最重要代言人，然而，此時的知識分子已經因為意識形態、知識、文化、社會和政治路線的不同而明顯分化⁷。其中一個與西方主流思想採取截然不同的對抗論述的，就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雖然社會主義在剛傳入時只被視為眾多學術理論中的一種而沒有受到很大的重視，但是俄國革命的成功讓同樣受盡帝國主義欺凌的中國大受鼓舞，也使得中國知識分子開始相信馬克思主義以及由馬克思主義實踐經驗所發展出來的列寧主義，將成為中國救亡圖存的一帖良方。

中國在經歷西方思想的洗禮後，雖然有些知識分子從西方國家觀中的主權、人民、領土來做為國家建構論述的依據，但很快的，一些激進的知識分子便不再以西方的現代化國家內容來做為中國國家建構的思考，並轉而以批判西方國家觀念的馬克思主義做為國家建構的依據。這不僅是由於他們對西方扶植下的軍閥和與西方關係不錯的國民政府感到失望，並因此而質疑依循西方先進國家的現代化腳步是否真的能讓中國的未來更好；更重要的是上述這些疑惑在馬克思主義裡幾乎都可以找到答案，讓他們能夠看穿西方資本主義、帝國主義虛假的一面和走向崩解的可能。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知識分子具有吸引力，這是因為它為中國知識分子提供了從西方觀點來評價並批評資本主義西化的可能性⁸。這種可能性不僅提供中國走出西方現代化國家理論制約的可能性，也為中國的國家建構提供一個建設的思考點。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中所強調的階級鬥爭，以及面對資產階級國家及帝國主義的批判所延伸出來的革命論述，大大符合中國當時對西方國家的不滿和希冀採取的行動。因此，與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系出同門」但卻不「同流合污」一同樣來自西方卻是以批判西方這兩套主流價值為內涵的馬克思主義，滿足中國知識分子希冀以一套新思維來取代傳統思維建構中國的未來，但又不希望依循西方帝國主義的角度使中國跟隨西方亦步亦趨前進的心態。很快的，馬克思主義便成為中國知識界的新寵兒，並且很快的便由理論面落實到實務面，中國共產黨遂應運而生。

⁷ 鄒謙，**中國革命的再詮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2002年），頁7。

⁸ 鄒謙，**前揭書**，頁4。

中國共產黨的出現其實是宣告在中國的國家建構觀念上存在著對西方國家理論的反思與不信任，同時也是對蘇聯建立新國家的一種仿效。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雖然是馬克思根據他對西方歷史的研究與詮釋所做的一種分析和總結，但是經過列寧在俄國的革命實踐以後，不但擴充了馬克思對黨建和黨組織操作方面的不足，同時也第一次以社會主義邏輯在東方建立一個有別於西方資本主義邏輯下所產生的民族國家⁹。這激勵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與建構有別於西方的國家觀念的可能。通過之前的論述我們可以知道，中國的國家意識和國家觀是通過西方的作為和思想建立起來的，但是這種國家建構理論，其實並未真正滿足中國知識分子，而且雖然清政府退位後中國在表面上建立了一個「大一統」的國家，但真正的權力仍是分散在擁兵自重的軍閥手上，軍閥割據的局面象徵了舊政權的延伸，而且西方勢力或多或少的與軍閥掛勾並且在中國領土內遂行他們的意志，這使得中國的領土和主權完整其實只是空話一場，民主共和國中的人民依舊只有為人魚肉的命運。西方國家理論所強調的三要素精神恰恰被他們自己在中國的種種作為給掩蓋了。因此，中國就算依循西方的國家理論建構新的國家觀念，卻無法真正的獲得獨立、民主與自由。

這種不信任與反思發展出具體作為，李大釗、陳獨秀等人於學報刊物上大力鼓吹蘇聯革命成功的經驗與馬克思主義，並匯集成一股力量，終於在蘇聯的幫助下於1921年7月由15個創黨元老在上海舉行「中國共產黨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一個奉馬克思主義為圭臬的革命政黨於焉出現。中共建黨初期的國家觀雖然不算完全成熟，但具體表現在一大的黨綱中，會中決議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推翻資產階級，實施無產階級專政，並且發動階級鬥爭¹⁰。這表現出中共的國家觀念亟思脫離西方的民族國家觀念，而將民族觀念轉換成階級的作法，換言之，國家的建構不是以民族做為起點，而是以階級作為主要的考量；國家間的「我者」與「他者」的關係不是來自於不同民族，而是來自不同的階級。至於國家間是對立還是合作，就要看階級之間是否有聯合的可能，這也是何以早期的中共可以在蘇聯的扶持下成立，並且願意聽從蘇聯指示的緣故，在以階級作為我者和他者劃分的標準下，蘇聯的第三國際成為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領導者，也是結盟的對象。可以說，這時期的中共，以階級來建構一個新中國的思想觀念超越了民族國家，不是說中共不重視民族，而是建立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更勝於建構一個民族國家，階級的位階之所

⁹ 參見Martin Carnoy著，杜麗燕、李少軍譯，*國家與政治理論*（臺北，桂冠，2002），頁53-55。

¹⁰ 中共一大的文獻資料，最具權威性的是陳公博於民國13年所寫的碩士論文，這份文獻一直躺在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中，直到1960年被發現為止。這裡對陳公博的論文資料使用是轉引自郭華倫，*中共史論*，第一冊（臺北：政大東亞所與國關中心共同印行，1969年），頁26。

以凌駕在民族之上，這是因為西方的民族國家已經被中共定位成是資產階級主導下的不公平、不正義國家，也因此這種國家才會發展出如帝國主義般的侵略行為，而中國在重新發展的同時絕不願意重蹈這條道路。這種思維的背後也使得中共走上一條以馬克思主義階級主義建立新國家的道路。

中共雖然確立以無產階級革命作為建設新中國的思維，並且在其後開始了種種的革命作為與手段，但是，這種思維指導下的革命並未讓中共如願的順利號召無產階級覺悟起來與資產階級進行鬥爭對抗，而且更差點遭到覆滅的命運。這固然是由於當時中國的分裂環境和國民黨勢力使得中共無法落實其革命理念，另一方面卻是由於中共尚未真正找出如何在中國進行階級革命的方法。早期的中共成立是十分具有理想性，對他們而言，西方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和國內的軍閥、國民黨以及資產階級都是必須要打擊、推翻的對象。因此，在中共「一大」到「六大」的文獻資料中，處處充斥著反帝國主義、反資產階級等的文字或意涵。然而，中共對階級鬥爭的過份強調，使它著重在依循馬克思列寧理論而忽略了在中國要如何具體落實的問題，另外就是對共產國際的服從，使它在某種程度上喪失了自主性。這使得中共早期的革命歷程充滿挫折，並且在領導人的不斷更迭與修正黨內路線下開始對蘇聯的領導和革命路線產生質疑與動搖。

肆、毛澤東的國家觀

中國共產黨在建黨初期希望以階級革命作為國家建構的方式和作法受到了阻礙，但是究竟是以階級作為革命核心出了問題？還是在執行手段上出了問題？抑或是對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的認知不夠？還是因為無法切實落實蘇聯的指導而導致失敗？這種問題通過反轉性的思考而在毛澤東手上得到解答。

毛澤東通過自身的革命經驗和對中國國情的具體考察，同時也通過列寧對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運用乃至於轉化的過程，理解到理論與實踐的關係不是單純的將理論作為實踐的指導而已，必須瞭解兩者之間的相互辯證性，革命的理論和意識形態必須與革命實踐經驗和具體國情相結合，簡言之就是做出與革命時空環境相適應的配套措施¹¹。在當時，單純的訴諸民族主義或階級主義來謀求新中國的建立都是一種迷思，前者掉入共產黨所批判的西方資產階級或帝國主義的國家道路，後者則難以號召廣大的人民群眾共襄盛舉。在中國，階級革命必須通過民族主義的訴求才能

¹¹ 參見李英明，*中國：向鄧後時代轉折*（臺北，揚智，1999），頁5-9。

具有發展的可能，而民族主義也必須以通過階級革命的方式才能走出與西方國家不同，屬於自己的道路，兩者呈現一種辯證結合的發展關係。

毛澤東通過階級主義，走出一條和西方民族國家迥然不同的道路；但他同時也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並未在強調階級的過程中忽略了中國的自主性。換言之，毛澤東的階級主義是建立在民族主義之上的。但是他也同時通過階級走出一條沒有民族的民族主義道路。亦即，毛澤東將傳統民族主義內涵的種族、血緣或地域觀念打破，用階級取代這些而重新建構一套階級民族主義，也因此，在毛的觀念裡，支持革命的人民群眾或階級就是屬於同一「民族」，是處於同一戰線的人，而不支持革命的人民群眾或階級，就成為被打擊的對象，這也是後來毛澤東形成「統一戰線」的基本思維。這種思維正好把西方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國民黨的官僚階級和舊社會的封建保守勢力全部置於革命的對立面；而讓社會中廣大的貧下中農以及工人階級和擁護革命的其他人士置於同一邊。特別是毛澤東在號召廣大的人民群眾的認同時，是以中國的貧下中農作為主要的訴求對象，這是毛澤東在具體實踐中觀察的結果，卻也是他認清中國實際國情而做出的正確選擇，這個選擇支撐他之後群眾運動的開展¹²。換言之，毛澤東認知下的馬克思主義實踐，是拋棄了中共之前的照搬蘇聯經驗或依循馬列主義教條，是站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立場上來談的。

按照毛澤東的階級觀念構想，是要讓廣大的無產階級群眾（包含工人和農民）從他們自身所附屬的階層社會中解放出來，從原本是最低層、最不受重視、最沒有權力的階層，被反轉成是國家社會組成的最重要力量。將原本已經乖乖的、認命的將自己的身體交給上流階層和軍閥統治或宰制的無產階級群眾，賦予他們重新檢視自己的身體存在的價值與位置的權利。讓這些一向被視為社會下層的無產階級群眾，通過這種檢視而醒悟到他們的身體並不是先驗的、命定的必須從屬於資產階級或上流社會的統治或宰制，而是由於資產階級建構、發展出來的典章制度或是遊戲規則，讓他們在不自覺中必須從屬、附屬於這種地位，並且毫無翻身的餘地。資產階級所定下的遊戲規則雖然也允許這些貧下階級人民可以通過受教育或其他管道擠身到上流社會，但畢竟只是少數，而且，通過這樣的途徑讓下階層人民產生努力便可以向上流動的思考，其實只是更加反證了自身所處階層的卑微與無用，而這種觀念其實已經是經過幾千年來的國家社會操作被奠定下來的觀念，也是這個國家社會操作運行的基礎。毛澤東認為，提出階級國家理論，重新賦予貧下中農新的階級身分，也就是新的國家公民身分，可以讓這些民眾願意追隨毛的階級革命理念，並

¹² Meisner, Maurice J.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New York: Free Press; London: Collier Macmillan, c1986, pp. 43-44.

且自願從屬於新的階級國家的位置之下。

毛澤東同時具備階級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辯證思考，雖然在後來的實踐上毛澤東似乎退回傳統的國家民族主義，但是我們要知道，只有在與西方或其他作為「他者」的國家（例如蘇聯）接觸時，毛澤東才會表現出國家民族主義的特質，但是在做為內部鬥爭時，毛澤東的心裡卻還有另一套民族主義的判準方式，那就是階級民族主義，也因此，毛澤東一直不忘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一直念茲在茲的是階級鬥爭，那是因為在毛澤東心中，階級民族主義或說是階級國家主義才是他念茲在茲的國家觀念。對他而言，通過階級所形塑、建構出來的國家，不但可以對抗西方的資產階級國家觀念，同時也能夠讓傳統中國封建制度解構，讓國家以及國家所形成的宰制機器擺脫屬於少數人的操作，重新回到廣大的人民群眾身上來。

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一方面抗拒西方的國家觀念，另一方面也抗拒中國傳統的國家觀念，並進而走出一條屬於這時代中國的國家道路，毛澤東的國家觀念，是在階級和民族兩者的辯證之下，走出一條屬於新中國的國家道路。所以，毛澤東在 1940 年的《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到中國革命的目的是：

……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與新國家，在這個新社會和新國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經濟，而且有新文化。這就是說，我們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把一個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後的中國，變為一個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一句話，我們要建立一個新的中國¹³。

並且，這種新的中國（新民主主義共和國）：

一方面和舊形式的、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共和國相區別，……另一方面，也和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的共和國相區別……，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形式，在一定歷史時期中所採取的國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種形式，這就是所謂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¹⁴。

毛澤東提到這個所要建立的新國家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¹⁵。」毛澤東也明確指出，「國體」就是社會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問題，而「資產階級總是隱瞞這種階級地位，而用『國民』的名詞達到一定階級專政的實際¹⁶」；而「政體」就是政權構成的形式問題，「指一定的社

¹³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頁624。

¹⁴ 同上註，頁636。

¹⁵ 同上註，頁635。

¹⁶ 同上註，頁637。

會階級採取何種形式去組織那反對敵人保護自己的政權機關」¹⁷。毛澤東對國家的建構和組成形式皆扣緊階級和國家的關係，同時表現出與西方和傳統中國國家觀念決裂的信念。毛澤東在其後的《論人民民主專政》更明白的表現出對西方國家觀的厭惡原因¹⁸。

毛澤東認為，中國的「無產階級、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小資產階級，乃是決定國家命運的基本勢力」。而在這些階級的共同作用裡，「無產階級則是占有領導的力量」¹⁹。毛澤東把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中的階級觀念結合起來，取代了西方現代化進程中演變出來的國家觀念，原來的農民身分屬於是「階層」而不是「階級」，毛喚起其階級意識，演變如後來批鬥地主、土地改革等情況，其實都是毛的新國家建構的作為。毛以民族和階級結合來做為國家建構的依據，一方面符合中國當時的被殖民心態使人民感覺就像處於最下層階級一般，從民族主義觀點引發出階級認同；另一方面也可以反轉西方文明所建構出來的既定的、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國家觀，從階級革命讓人民得以重新凝聚民族認同。

然而，毛澤東的階級國家理念雖然可以為中國的國家建構開出一條屬於自己的道路，但是當時毛澤東在黨內尚無法全面落實自己的理念，來自反對者的意見和黨內的分歧看法，使得黨員的思想結構和黨的組織都顯得凌亂與鬆散，因此，毛澤東需要通過一套意識形態的操作，讓黨員的思想和黨的組織都嚴密起來，讓黨員願意全心追隨毛澤東的革命理念完成新的國家建構。而延安整風的操作，就是毛澤東為了將黨員的思想和黨的組織建立起來，讓自己的國家建構觀念澈底落實到黨員心裡成為黨內最高的指導依據所做的具體實踐。

伍、毛澤東的國家觀操作：延安整風

作為中共黨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延安整風的出現具有褒貶不一的評價，然而，在國家建構的觀點上而言，正是因為通過延安整風的成功操作，才使得毛澤東在中共建政後敢於發動土地改革和文化大革命，讓中國人與過去的歷史意識和西方的現代發展史觀產生截然不同的發展，開中國千年未有之變化。有人將延安整風視為是毛澤東用來整肅異己和鞏固自己政治權威和意識形態主導權的大規模群眾

¹⁷ 同上註，頁637-638。

¹⁸ 毛澤東在「論民主主義專政」中，坦承自己在年輕時候也學習西方思想，但是帝國主義的種種作為，使得「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心中，一起破了產。」請見毛澤東，「論民主主義專政」，**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頁1047-1048。

¹⁹ 同上註，頁635。

運動，認為延安整風是一場大規模的整黨和肅反的殘酷鬥爭，是一場毛澤東純化黨員思想和行為模式的「清洗」運動²⁰。但也有人認為這一場空前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和思想解放運動，是一場成效卓著的黨的建設活動，促使了延安精神的產生，奠定其後的抗戰和建政基礎。換言之，延安整風雖然在反對者的眼中被視為是毛整肅異己、攀往權力頂峰的鎮壓手段。但是，由延安整風所歸結出來的延安精神同樣被很多人視為是黨內組織建設的最重要因素，是後來中共建政得以成功的一個關鍵。一個值得我們關注的焦點是，延安整風作為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毛澤東何以「要」而且「能」發動延安整風，「要」或許可以是主觀的作為，但「能」就需要客觀環境的配合了。延安整風的目的、過程與手段在不同的研究面向下可以呈現不同的解讀，但是在新中國的國家建構上，延安整風確實扮演一定程度的重要性，而這又必須回到毛澤東的國家觀上來做論述。

毛澤東意識到要貫徹以階級和民族主義辯證發展的國家道路，一方面必須去除中國人心中傳統的國家與個人分離的觀念，讓個人可以真正附屬於國家。另一方面則要去除自五四以來西方國家主義對知識分子的制約，讓這些人的觀念從西方思想的制約下解放出來重新以中國的角度來看待中國的國家建構。這就涉及到如何讓中國人民重新看待自己在國家中的位置——也就是如何把自己的身體從傳統中國的宗族社會或朝廷觀念中解放出來，但是又不會落入西方的資產階級國家觀念裡面，而能夠將自己的身體通過民族主義和階級革命的歷程而附屬在一個整體的國家概念下。相同的概念也適用於黨組織和黨員思想的建構，如何讓黨員將自己的身體和思想都附屬於黨，是黨組織建構能否成功的關鍵因素。因此，對毛澤東而言，整頓「三風」是為了去除中國傳統遺留下來的簡規陋習和建立新的文化意涵來作為建構集體認同的基礎，而王實味和丁玲等人，犯了以西方的資產階級國家觀念來批判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都是需要被改造、被整肅的對象。毛澤東亟欲建立一種基於中國民間傳統的新的文化藝術，並以此為工具來縮小知識分子與農民間的差距。而王實味在文化爭論中站在毛的對立面，其言論恰恰使他成為毛所亟欲打倒的「高等文化」或是「現代主義」的樣版²¹。王實味和其追隨者都以為毛澤東要走的是五四以來的西方現代自由民主的國家建構道路，所以用西方的觀點來批判毛以及其追隨者，這是完全誤解了毛，毛要走的是一條有別於中國傳統、有別於西方現代自由民

²⁰ 關於對延安整風批判最力的代表著作，可以參見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另外，也有從操作方式來評斷毛澤東延安整風的意義，參見金觀濤、劉青峰，「反右運動與延安整風」，**二十一世紀**（香港，1997年4月）

²¹ 馬克·賽爾登（Mark Selden）著，魏曉明，馮崇義譯，**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頁303。細節部分亦可參考高華，**前揭書**，頁319-353。

主甚至是有別於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國家道路。

延安整風通過面對自我和批判自我的方式讓黨員開始反省自己，先是通過教育手段和思想改造讓黨員將自己的身體、精神和意識與原本的自己相抽離，然後通過批判的方式，讓黨員在集體意識塑造與對話（批判與自我批判）的過程中將個人意識融入集體意識中，並且通過集體意識的凝聚塑造出一個集體認同，同時也塑造出個人在集體中新的身體、精神與意識歸屬。在這個過程中，黨員與自己以往錯誤的、不純淨的身體、精神和意識相分離，讓一個「壞」的自我從過去的時空中被解放出來，然後讓自己的身體、精神和意識附屬於黨所提倡的階級意識和革命意識。這個「全新」的生命，一旦通過黨的鑑定，一個無產階級革命「新人」就誕生了。從此，個人有了新的歸屬，此生不但在思想上，而且身體和生命都毫無保留的屬於黨。世界上少了一個個人主義或小資產階級，而又多了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戰士²²。換言之，延安整風最大的意義讓黨員的身體不再屬於個人、不再屬於傳統社會或傳統思想，而是改頭換面，讓黨員的思想和身體、生命都附屬於階級觀念、附屬於通過階級概念領導下的革命，進而附屬於之後通過階級革命所建立起來的國家。

在毛澤東的想法中，通過這種大規模的思想淨化活動，以階級革命為主軸，通過整風將黨員的心理、身體和生命從傳統的社會規範、人我關係以及根深蒂固的宗族關係甚至是君皇思想解放出來，並讓黨員在集體意識的操作上將自己的身體、思想和意識都附屬於黨、附屬於革命、附屬於無產階級國家。讓黨員從以朝廷、社會、宗族等不同認同的小範疇中解放出來，全部納入一個以階級為主的整體大範疇裡面。讓黨員不再屬於自己、屬於宗族、屬於社會，而是屬於廣大的階級，屬於之後由階級革命所建構起來的國家²³。不可否認的，在這個過程中毛的思想和意識形態自然成為黨內唯一尊奉的最高真理與指導原則，然而更重要的，中國共產黨從來沒有建立出來的集體認同，也通過這個過程被建構起來，身體或意識與黨和革命的關係被緊密的結合起來，身體或意識組織化或革命化成為之後國家建構的最重要支撐點。延安整風形成一種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把人和團體結合成緊密關係和改造人內心世界的力量²⁴，使全黨的意識形態達到高度的統一，這種意識形態是

²² 高華，**前揭書**，頁435。

²³ 高華認為，毛澤東的整風使用教化與強制兩種手段，與斯大林的大規模的肉體消滅不同，主要是因為兩者的政治目標不同，斯大林是在蘇共執政的條件下為了要鞏固自己的獨立地位而濫施暴力，毛則是要先在政治上打敗留蘇派，完全確立並鞏固黨內的領袖地位，進而取得抗戰勝利後取代國民黨，建立他本人對共黨和中國的統治。參見高華，**前揭書**，頁393。

²⁴ 金觀濤、劉青峰，**前揭文**。

一種以無產階級立場為基礎的革命實踐觀念，也是日後中共建政得以成功的重要基礎。

當然，延安整風也產生了不少負面影響，估不論延安時期有多少流血事件，它在許多人民群眾的內心也投下相當大的陰影。整風運動吞噬掉了一切屬於個人的生活思想情感空間，外界所形成的集體力量對個人形成極大的壓力，迫使他們成為群體的一分子並接受思想改造，導致黨員的自我空間縮小，甚至到了不存在的地步，對人的自我主體性產生無可彌補的斷傷。而「新人」的成批鍛造的同時，也出現許多保守苟且、渾渾噩噩的「機械人」；同時原來革命中所產生的同志情誼也在這種氛圍下被冷漠、猜忌、互相防範所取代²⁵。延安整風雖然建構了一個整體的意識形態，但卻也讓人彼此之間的關係更加疏離，這種疏離表現在人與人緊密連結的背後，形成一個奇特的關係網絡。

解釋這種奇特的現象的成因，其實也正好回答毛澤東何以「能」進行延安整風的原因。除了種種壓制或人為手段的操作外。延安整風其實是建立在對中共之前革命失敗的基礎上，以及由失敗所引發的失落感和反省，這種反省促使黨員希望能找到一個有力的觀點可以解釋過去的失敗，同時也預告未來的勝利可能，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正符合這樣的期待與訴求，而毛訴諸群眾的作法更讓作為人民群眾的黨員相信建立一個無產階級和廣大階級群眾的國家是有可能的，而延安整風正是為了消除之前的錯誤思考和作法，以求達到之後的成功。在這樣的基礎上，相信有許多黨員是懷抱熱情參與整風進行的，也因此，儘管整風在後來的研究中褒貶評價不一，卻依舊有很多當時參與的黨員對延安精神難以忘懷。

延安整風的成功經驗，奠定了毛澤東階級國家觀實踐的基礎，也使得毛澤東得以通過這次整黨的經驗，在建政成功後推動土地改革，將自己的國家觀念通過土地改革的方式達到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當然不可否認的，延安整風的過程包含毛澤東對黨內權力的追求與爭奪，這可以視為毛澤東個人政治生涯中一次成功的操作，然而這種通過民粹主義或群眾運動操作成功的經驗，也埋下日後毛澤東發動大躍進和文革發生的種子。

²⁵ 高華，前揭書，頁436。

陸、結 論

社會科學研究一個有趣的地方在於，從不同的角度切入做觀察，往往會有不同的詮釋和推論。研究者所處的立場，會制約他以何種視野和角度切入來觀察研究課題的存在與發展，同一個議題或事件，不同的研究方法或研究途徑會帶來不同的結論。然而，這正好也告訴我們，所有的事情都具有許多面向，同樣的，導致事情發展的因素也有很多，研究者往往只能就其中一個或幾個面向作觀察與分析，並由此做出詮釋與推論，但並不表示這便是唯一或絕對的推論或詮釋，絕對的或直線式的因果觀帶來的往往是見樹見林所引發的迷思，本文所做出的論述亦然。

中共國家觀的建構是一個時代的產物，從陳獨秀到毛澤東，第一代的中共革命元老經歷的是一個動亂的中國，同時也是一個迷失的中國。因此，如何在革命的實踐過程中，摸索如何讓中國可以走出一條不同於舊時代的富強之路；又不會落入西方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誤區中，更不能因此喪失中國的自我主體性，就成為從毛澤東以後中共領導人在建構新中國所念茲在茲的事。當然，不同的視野和詮釋造成不同的史觀，中共的國家觀的形成與建構乃至操作可以通過不同的研究方法與途徑，而有種種不同的觀察、分析與詮釋，這或許也正是社會科學研究應該具有的面貌吧！